

印記

Yinji
Yongning

永宁

第一章 —

南樵悠悠

尽阅永宁春秋

增城有座南香山，盘踞于增城南部，昭然坐落于永宁街，自东向西横贯永宁，把永宁分为北宁南永。永宁相汇，其义深远。这是南香山的真诚祝福，是永宁人的梦寐以求。此般愿景天随人意，人与自然如此和谐统一。

清人屈大均所著《广东新语》称“广州有三樵：曰东樵、曰南樵、曰西樵。西樵者南海之望，而东樵者罗浮之佐也”。南樵山与东樵罗浮、南海西樵鼎足而峙，号称“三樵胜景”。其实，南香山并不峻峭，却有“岩峣太华俯咸京”之势；南香山并不峻峭，却有山势如涌出，突兀压沃野之力。南香山海拔仅433.2米，但它突出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平原，其南面是“山随平野尽，连接大江流”的平畴台地。因此，它成为珠江、东江航行辨别方向的标志，被称作“船桅峰”，一度成为佛教、道教传经说道的胜境，成为鸿儒、圣贤寻踪探秘、赋诗泼墨、设坛讲学的精神之所，成为芸芸众生求学问道、祈求弭灾消难的神圣殿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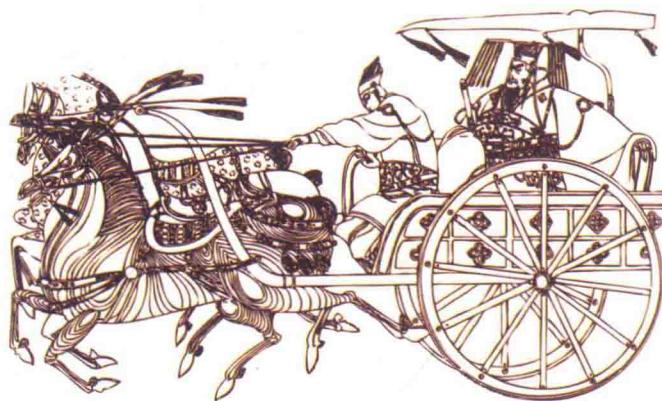
天地自然气，千秋尚凛然。南香山聚各朝各代鸿儒所咏之诗，汇各朝各代释道所播之玄，合各朝各代彦士所倾之情，得文明之光华，养六合之浩气，阅尽永宁春秋，娓娓地诉说着永宁街的前世今生。





文明溯源

增城在先秦时期是古越族的栖身地，永宁也不例外。古越族所创造的史前文明，并不逊色于中原文明。金兰寺遗址、老虎岭遗址、围岭遗址、浮扶岭古墓葬、西瓜岭窑址所发掘的石器、陶器无不雄辩地证明，增城有着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。永宁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史前遗址，但人们却从古迹和古村落中发现，永宁是增城地区最先浸染广信文明的区域之一，沐浴广信文化或许比增城各地都要来得早些。



白花寺、木古村的文明密码



①永宁民众现称“百花寺”，旧版《增城县志》一直称“白花寺”。

②李德，增城宁西人，民国时期任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记者，新中国成立后任职宁西。20世纪80年代初参与增城文物普查工作。

③“书院”之名肇始于唐，兴盛于宋。唐代以前讲学之所不称书院，多以“苑”或“舍”命名。估计此碑文是唐宋时期重修所撰。

邑人赖际熙主编的《增城县志·卷十一祀典·寺观》设有“白花寺”^①条目，称“白花寺在县治西五十里南乡山麓，乾隆二十九年重修，增建书舍，以为肄业之所，有田二十余亩，给僧赡守”。赖氏只叙述重修时间，而按下始建不表，说明白花寺始建于何时，在清代已属无考。清志依据明志，估计明代亦然。唐宋时期呢？《增城县志》凡涉唐宋之事，都称唐宋以前无考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增城县曾组织文物队深入境内各处详查文物。1983年6月5日《增城县文物普查简报》第6期刊发文物普查员李德先生^②《白花古寺小考》一文，引起各方关注。该文称，白花古寺古已有之。据白花寺重修碑文载，白花古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（58—75年）前身为莲花书院^③，古寺供奉释迦牟尼，大雄宝殿有释迦牟尼像。

白花寺屡毁屡建，屡圮屡葺，达五百多次。现仅存“白花古寺”四个阳文石刻大字，余则一无所有。白花古寺始建于何时，虽有历史存疑，但说其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，有碑文可证。佛教于汉代已



由海上传入岭南，况且，东汉明帝宣扬佛教，曾敕令在上元之夜“燃灯敬佛”，并亲自至寺院张灯。这说明东汉明帝时期已具备建寺传播佛教的文化环境。再则，在古寺中曾挖掘出唐朝的柱础。这说明，古寺至迟于唐代就已经存在。此外，南北朝时期，从增城县分出西福河以西地区置绥宁县，县治应在仙村沙滘以北西福河沿岸。也就是说，永宁以东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曾是绥宁县的经济文化中心。这都说明古寺于汉或两晋存在的可能性。

再说说木古村。永宁人自信，常称“未有增城，先有木古”。坊间之说，是有出处的。

增城已故文史工作者赖邓家编著的《增城地名大全》称，此村是永和镇建村历史最早的，建村于东汉。增城建县前，此地属番禺，最早迁于此的沈氏族群来自番禺。开始该村称为古木。后沈氏迁走，黎氏续居，黎氏散，李氏、刘氏迁来，改称木古，以示区别。新编《增城县志》说到木古村时，是这样表述的：“相传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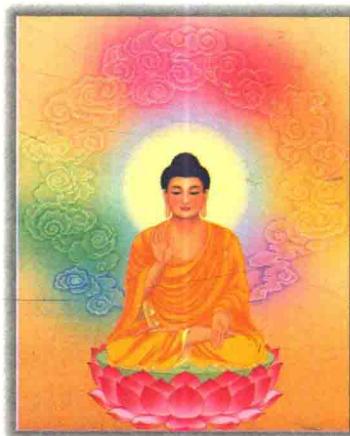


内古木村唐代已成村，居民操本地话（今粤语）。”唐代成村，迁居要早于唐。

要破译白花古寺、木古村文明密码，有必要说说增城以外的文化现象。清人屈大均曾在《广东新语》里说，广东文明“始然于汉，炽于唐宋，到有明乃照于四方焉”。秦始皇征服南越，汉越杂处，珠江文化便开始萌动，并历经积淀和发展。至汉武帝灭南越国，从“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”的诏示中，取出“广信”二字，作为当时创建监察岭南九郡的交趾部刺史部衙署所在地的县名。从公元前111年建交趾部到公元264年交州划出广州为止，以广信为州治的时间持续近四个世纪，史称“广信时代”。这一时期，北方移民纷纷南下避乱定居，南北文化进一步交融，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文化板块。珠江文化研究者指出，粤语发源于广信，故又称广府语，其语言结构有古汉语成分，也有越族语成分，是以汉化为主导，与多元化文化融合的典型体现。广信文化时代，出现了两个领军人物，一是陈钦，

崇尚经学，是著名的经学家；二是东汉牟子，原是儒家学者，后通道家学说，佛学从海上传入不久^①，便研究佛学，是“三教合流”的首创者。广信文化由西而东，不断传播。早在公元前203年，赵佗建立南越国，定都番禺（广州），广州成为岭南东郊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。赵佗推行汉越通婚，汉越交融而形成的广府文化已具雏形。一大批中原衣冠望族定居番禺。汉武帝灭南越国。战乱时期，一批原居住在广州的广府族群纷纷避乱迁徙他处。安定时期，又有大批的中原人迁往广州。作为广州郊郭的永宁地区，理所当然地成为迁徙族群的首选之地。木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村的。其实不仅是木古，在南香山腹地的百湖、冯村、郭村、路边村，据当地村民称，在他们先祖迁来之时，这些地方已有操粤语的族群聚居。

两汉到三国时期，广州私人办学风气日盛。最著名的是吴国名臣、经



^①佛教于汉代由两路传入中国，一路从海上传入岭南，另一路从陆上传入长安。

学家虞翻的“虞苑”。虞翻潜心著述，广招门生，在广州讲学十余年，四方之士慕名而至，门生多达数百人。随着私学的日益发展，由陈钦、牟子、虞翻培养出来的贤士俊才纷纷走向名山，设坛讲学，或传经布道，或说儒论佛，热衷播撒广信文明。白花古寺或许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其宣扬的儒释道精神，明显带有牟子“三教合流”的影子。白花古寺分明是供奉释迦牟尼的佛寺，却要冠以书院之名，这是佛学刚传入岭南之时，佛家住持不得不采用的变通方式。

白花古寺和木古村以其自身的特质，向人们展示了历史赋予的文明密码，它告诉人们，在东汉及两晋时期，永宁大地已经浸润着广信文化的甘霖。永宁大地之所以能得广信文化之先，皆因地域邻近广州和南香山昭然于珠江、东江航线，是风气使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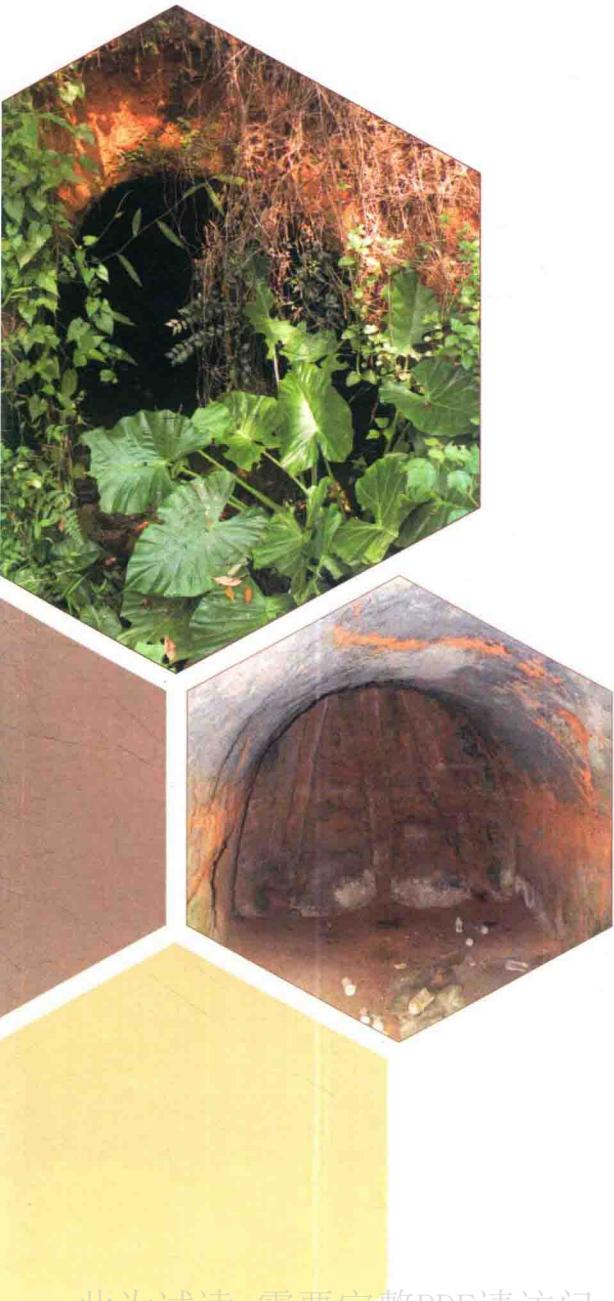


打水坑窑址物语



打水坑窑址位于永宁街斯庄村打水坑山鸡石南面山坡上，是宋代用于烧造城砖的马蹄形窑。该砖窑是专为广州烧造修筑城墙用砖的遗址。窑址中遗落打有“广州修城砖”5个楷书的长条形戳印的青灰色砖块，也见打有“增城”字样的残砖。窑址东临西福河旧河道，看得出，当时出窑的成品砖是由水路运往广州的，今河岸前移了300多米。

两宋时期，广州城市建设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。广州作为路、州、县三级行政建置治所，城垣扩建和修缮有十余次，按中原京城规制，分出官署、坛庙、学室、道路位置，划出功能区，形成了中城、东城、西城组成的广州宋城。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修城砖，当时专为广州提供修城砖的窑到底有几家，我们无从知晓。增城永宁斯庄打水坑窑址，就是一家专为广州修城提供修城砖的生产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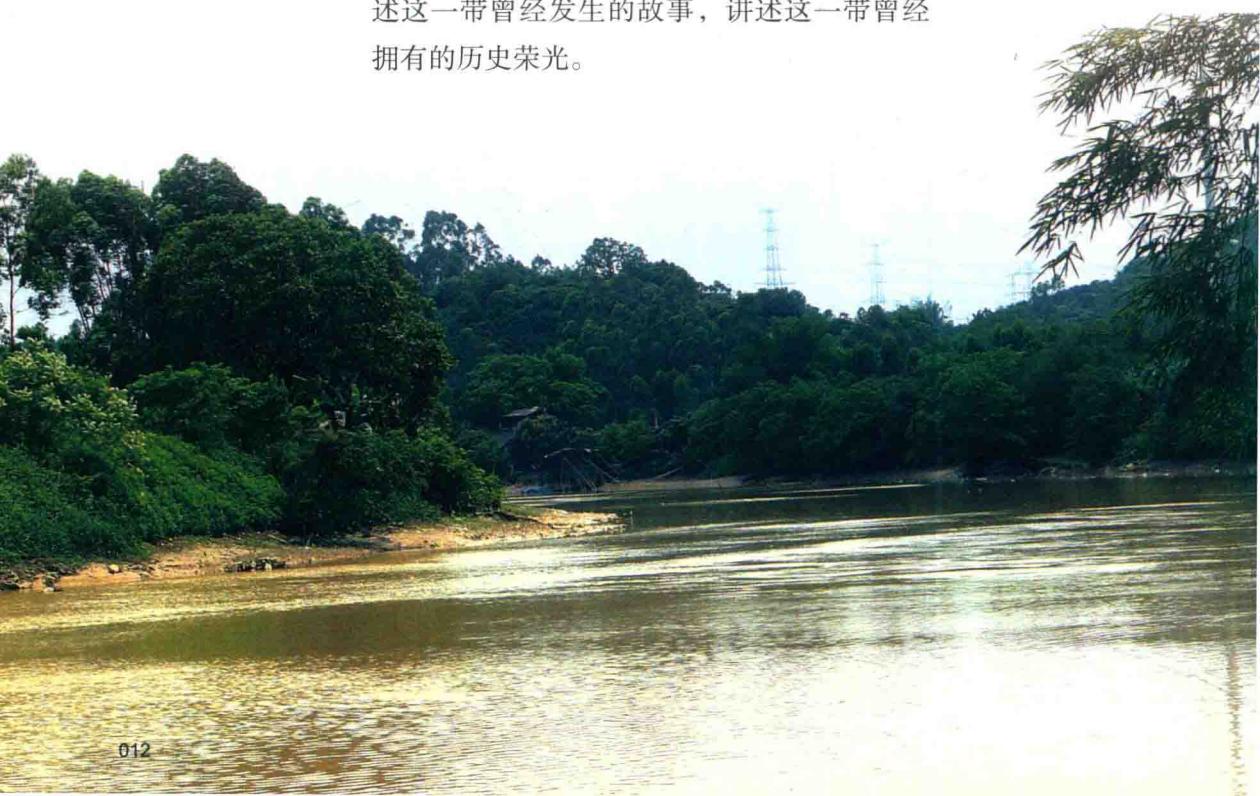


生产基地的建立至少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一是当年打水坑一带居民点较为密集，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，能确保提供充足劳力资源；二是打水坑西福河段理应建有运载窑砖成品的航运码头；三是建立了管理严密的监督机制，确保窑砖成品运往广州，而杜绝运以他用。打水坑砖窑，昌盛于宋有迹可循。永宁斯庄一带，人声鼎沸于宋也有迹可循。早在南北朝时期，由斯庄到冯村东西一线，由斯庄到仙村南北一线，均属于从增城划出的绥宁县。《增城县志》载：宋文帝元嘉年间（424—453年）“分增城置绥宁县”，县治在仙村沙滘一线。古代，把一个地区设置为县，主要因素是看人口规模。当时万余人左右就可置县。再则，到宋朝斯庄一带的郭村、路边村、百湖村（当时为广府族群，后迁出）均已立村。



由此可见，广州之所以把斯庄定点为修城砖生产基地，除了斯庄具有生产窑砖的原料外，还看中了斯庄一带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技术。永宁文明“始然于汉，炽于唐宋”是有史实根据的。

宋朝窑址村外尽，南樵秀色记忆深。打水坑窑址，随着汩汩的西福河水，深情地讲述这一带曾经发生的故事，讲述这一带曾经拥有的历史荣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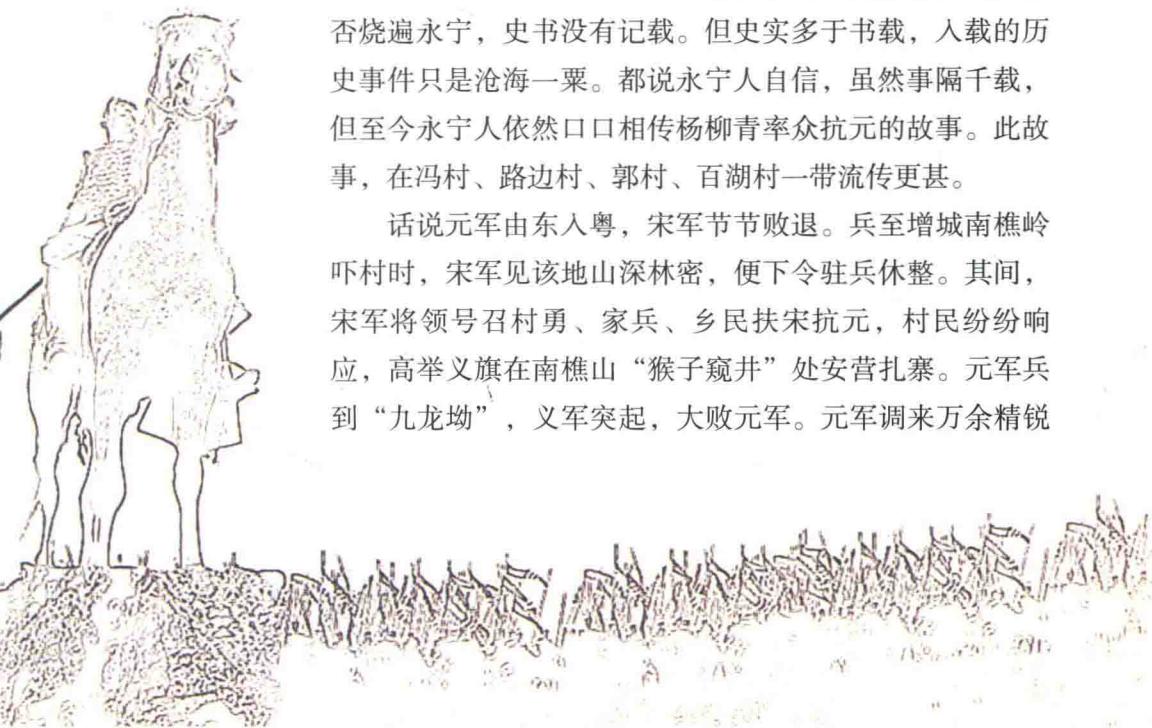


忠君情结，岭吓村的不老传说

1277年，元军分两路攻入广东，兵锋直指广州。宋军兵败石门后，广州失守。据陈大震《大德南海志》载：广州在战火中遭受重创，居民“或罹锋镝，或被驱掠，或死于寇盗，或转徙他所，不可胜计”。后广东状元张镇孙领兵曾一度收复广州，但最终落入敌手。一批将领宁死不屈，被杀于广州。乡亲们将英雄奉祀为贤士。

南宋惨烈覆灭，重创永宁大地各族群的心灵，永宁街是广州的东部屏障，当年广州郊郭城巷两度激战，战火是否烧遍永宁，史书没有记载。但史实多于书载，入载的历史事件只是沧海一粟。都说永宁人自信，虽然事隔千载，但至今永宁人依然口口相传杨柳青率众抗元的故事。此故事，在冯村、路边村、郭村、百湖村一带流传更甚。

话说元军由东入粤，宋军节节败退。兵至增城南樵岭吓村时，宋军见该地山深林密，便下令驻兵休整。其间，宋军将领号召村勇、家兵、乡民扶宋抗元，村民纷纷响应，高举义旗在南樵山“猴子窥井”处安营扎寨。元军兵到“九龙坳”，义军突起，大败元军。元军调来万余精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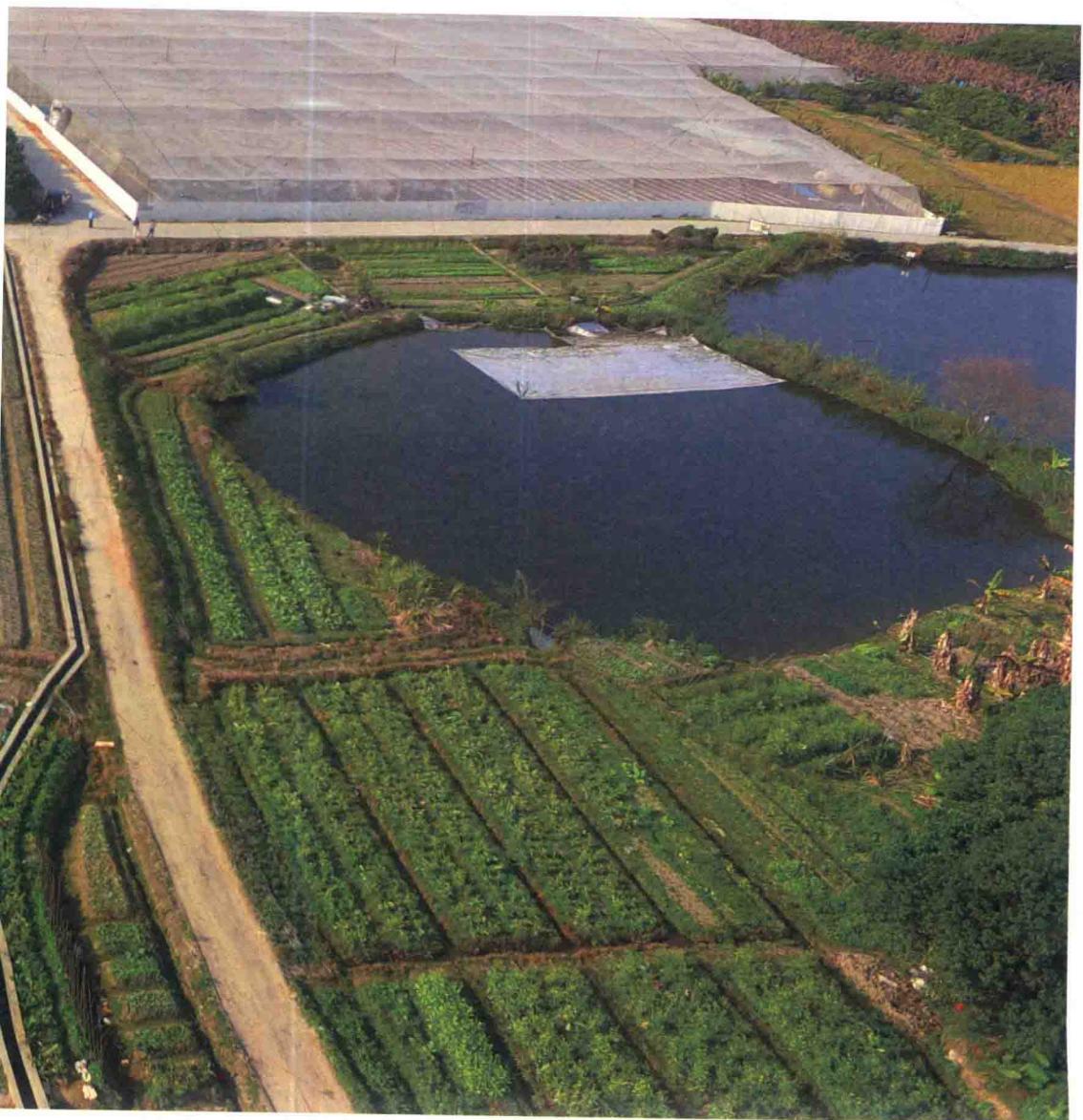
骑兵驰援，遮天盖地，把岭吓村重重围困。

宋军撤出战斗，继续南走。

岭吓村道士杨柳青眼见大兵压境，立即组织村勇层层设防，奋力保卫家乡。元军不断增兵强突，岭吓村终告失守。元军下令屠村，烧杀掠奸，无恶不作，可怜村民惨遭屠戮。岭吓村村毁人亡，幸存者背井离乡，岭吓村的原住民就此消失于历史中，但村名仍赫然于清代的《增城县志》中。据李德载文称，岭吓村开居于唐朝。到宋朝，该村已发展成一个墟市，手工业较为发达，显赫一时。当地有一句谚语：“岭吓佬抢粽——白造”，意思是岭吓人一出手，你就白干了。谚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岭吓村的强盛，遗憾的是方志对此没有记述。

杨柳青率众抗元，壮怀激烈，虽败犹荣。村民口口相传，皆因忠君情结。忠君情结，源于古之士大夫遗风，植根于永宁大地，是乡间经典文化之不败之花。





◎ 绥宁都、清湖都的记忆

从南北朝宋文帝元嘉起到隋朝，永宁街是绥宁县的属地；隋废绥宁县，把绥宁县划归增城；明清时期，增城设十二都，永宁街原宁西片属绥宁都，原永和片属清湖都。绥宁都统村88个，西福河西北区域均为今天永宁街之宁西地界；清湖都统村122个，除永和全境外，还包括今天新塘镇的白石、瓜岭、上邵等。

宋元时期，永宁街广府族群聚居的冯村、郭村、路边村、白水村及章陂、石迳、陂头均已立村，现为客家族群聚居的塔岗、长岗、岗丰、百湖、斯庄也已立村，但为广府族群聚居。明清以后，客家族群陆续迁入永宁各村。

广府和客家两大民系，在永宁大地上逐潮建村、开山建村，筚路蓝缕，垦荒造田，筑陂引水，挖塘养鱼，筑基种果，形成了果基鱼塘、蔗基鱼塘、菜基鱼塘、树基鱼塘与村落榕树、河涌、镬耳屋相互辉映的典型乡村景观。

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。到清末，永宁街兴修的水利包括木棉陂、百姓陂、鹤子山双陂、宋家陂、金竹约陂、黄泥陂、沙陂等。这些陂圳大多是多村合力建成的，是团结协作的结晶。

商贸集市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基础。到清末，永宁街开设的墟市包括永和墟、悦来墟、来安墟及百湖墟等。这些墟市有力地推动了永宁大地的商业文明与繁荣。

粤客两大民系，共同生活，相互渗透，相互交融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永宁文化。



莲洞书院化育风尚

书院之名肇始于唐。在宋元明清诸朝，书院为官方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，书院教育的存在，弥补了官学的不足。朱熹就书院的兴盛有过这样的表述：“士子病无所学，往往相择胜地，立精舍，以为群居讲习之所。”书院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。

邑人、明朝大儒、三部尚书湛若水，一生以“择胜地、立精舍”以奉祀恩师陈献章，以培养弟子，培育风尚为己任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湛若水告假回乡，偕知县文章、教谕汤仁等择胜地南香山筹建书院，选址于白花古寺。其间，湛若水先后写下《同游峨眉山莲花洞有作》《再宿莲花洞作》《莲洞摩崖颂》，抒发建莲洞书院的喜悦之情。莲洞书院建成后，一度在此讲学，吸引四方学子辐辏造访，